

1561·45  
6:1

# 神秘的墓石

(英)杰克·希金斯 著  
刘锡珍 李全文 译  
康艺 校



29837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先声  
封面设计：张士楠

## 神秘的墓石

〔英〕杰克·希金斯 著  
刘锡珍 李全文 译 康艺校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佳木斯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1 8/16·插页2·字数270,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500

---

统一书号 定价：1.00元

## 内 容 提 要

1942年，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战火仍在熊熊燃烧，它继续毁坏着和平的城市和乡村，吞噬着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民！然而，尽管战事犹酣，可是谁胜谁负却已见端倪。

希特勒怎能眼睁睁地瞅着自己一天一天走向失败呢！他在力挽败局，企图有朝一日能在谈判桌上增加一个更大的筹码，仅仅根据来自英国的一份情报，便立即指令特务头子希姆莱，秘密地选拔一批非常精干、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一支小分队，空投至英国某一海滨地区，化装潜伏，伺机行事，阴谋绑架来此度假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结果，德国的阴谋全部失败了！

德国当时企图绑架的真是英国的首相吗？并不是，那只不过是一位扮相逼真的假丘吉尔罢了。而丘吉尔首相本人却早已飞往非洲大陆某地，与另外某几个国家的领袖商谈有关战争的大事去了。

## 前　　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星期六，凌晨一时整，德国党卫军首领、国家警察头子——海因利希·希姆莱，收到一份言简意赅的情报：“鹰已降落”。这意味着一小股德国伞兵，此时已在英国安全着陆，正伺机绑架在靠海的诺福克郡乡下安度周末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本书就是再现那次惊人之举的有关事件。至少书中的一半内容是有案可查的历史事实，读者可自行琢磨，其余部分哪些属推测，哪些是虚构的……

# 第一章

我由门口走进公墓时，有人正在一个角落里挖坟。这一景象十分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因为下面发生的一切事情似乎都与此地有关。

在我穿过一个个墓石，朝着挖坟的那个人走去时，五、六只乌鸦哇哇地从山毛榉树上忽地飞上了天，就象是几小块破黑布腾空而起。我竖起军用雨衣的领子，抵挡着扑面打来的雨点。

有人正在那座挖着的墓穴中低声自语，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我躲过从墓穴中扬上来的土屑，站到新翻出来的土堆旁边，往墓穴中瞧了瞧，说：“今儿早上的坏天气，干这种活儿可不怎么样。”他抬起头，停靠在铁铲把上。看上去象个年岁很大的老人，头戴一顶布帽，身着沾满泥土的破衣裳，肩上还背着一个粮袋。他那深陷的双颊上长着灰色的硬胡子，眼睛湿润而且有些茫然。“下雨了。”我又试着说了一句。

他明白过来了，看了看阴沉的天，搔了搔下巴，说道：“我看在转晴之前还会更糟。”我说：“这会使你干活更费劲儿了。”墓穴底层积了起码有六英寸深的水，他用铁铲戳了戳墓穴的边端，水顿时被溅溢开了，象是有什么腐烂的东西往外冲去，泥土象雨点般地涌上又落下。“没准儿。这些年来，他们往墓地里放的尸体太多了，不再是往土中埋，简直就成了往人的遗骨中葬。”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露出了没牙的齿龈，随即又弯下腰，在他

脚下的土中搜摸着，抓出了一节指骨，对我说：“懂我刚才说的那些话的意思了吧？”即使是职业作家，有时也会对生命的千变万化无从解释。我决定继续跟他攀谈。“我看这是个天主教堂，对吗？”“当地的天主教徒总是到这儿来。”他说。

“你可能愿意给我帮点忙吧。我正在这个教堂里找一个人的墓，或者说是一块碑石。他叫盖斯考涅——查尔斯·盖斯考涅，是位船长。”我说。“从没听说过这么个人，”他说，“我在这里都上了四十一年教堂执事了。他是什么时候下葬的？”

“大约是一六八五年。”我说。

他的表情毫无变化，随后沉静地说：“啊，是呀，你看，那比我出生的日子还早。维里克神父或许知道点情况。”

“他在里面吗？”

“不在的话，就在祭司住宅，树丛那边的墙后面就是。”

就在这时，不知何故，我们头顶上山毛榉树丛中的乌鸦突然骚动起来，成群地在雨中盘旋，乱哄哄地又吵又叫。老人看了一眼，把挖出来的指骨往树枝中一扔，随口说出一句使人意想不到的话来。

“吵吵嚷嚷的混蛋，”他喊道，“滚回列宁格勒去吧！”

我正欲离去，却又立刻止住了步，感到迷惑不解。“列宁格勒？”我问，“你怎么扯到那儿去啦？”他回答说：“它们是从那儿来的，八哥也是。它们曾被困在列宁格勒，因太冷没法呆，十月份就转移到这边来了。”“只是这样吗？”我追问了一句。

这时，他变得活跃起来，从耳后取下半截子烟，放在嘴上：“那边的严冬足以把铜猴身上的睾丸给冻下来。打仗的时候，许多德国人都在列宁格勒给冻死了。既未中弹，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纯粹冻死的。”他的这一番话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接着问他：“这些事是谁告诉你的？”“关于鸟的情况吗？”他反问道。刹那间，

他的态度完全变了，脸上露出一种神秘的狡诈相。“怎么啦？是沃拿对我说的。他对鸟类了如指掌。”“沃拿是谁呀？”“你问沃拿吗？”他眨了眨眼，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那种茫然的神情又出现在了他的脸上。“沃拿是个好人，一个好小伙子，他们不该那样对待他。”

老人弯下腰，又开始拿铁铲挖起来，就象旁边没有我这么个人似的。我又多呆了一会儿，对那个听起来颇引人入胜的故事，显然他是不想或不愿多说了。我转过身，穿过那些墓碑，朝大门口走去。

我在门廊内停了片刻，发现墙上有一块用深色木头制成的告示板，上面有用退了色的金漆写的字：“圣玛丽教堂和斯塔德利镇全体圣徒”，木板上下写有做弥撒与忏悔的时间，落款是菲力浦·维里克神父。

橡树门十分破旧，用铁箍拢着，装有螺栓。门把手是一只铜狮子头，口里含着一个大环，把环转到一边才能把门打开，发出一种奇特的吱嘎声。我以为里面准是幽暗昏黑，不屑一顾，没想到竟是中世纪天主教堂的缩影，光亮夺目而又惊人地富丽堂皇。本堂的拱廊很宏伟，巨大的诺曼支柱高擎，非同寻常的木制屋顶，柱上精雕细刻着各式各样的人体与兽形，异彩纷呈。在齐屋项处，两边各有一排开窗假楼，刚才我进屋时不知从何而来的光源，就是从那里投射进来的。教堂里有一个雅致的圣水石潭，它旁边的墙上有一块漆过的木板，上边有多年在此任过圣职的所有神父的名字。从一一三二年一个叫拉夫·德·考西的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接任的维里克神父止。又是那个维里克！

在另一边，有一个小而暗的礼拜堂。燭光在圣母玛丽亚的像前闪烁，象是飘忽不定的火焰。我从旁走过，由座位之间的过道往前去。教堂内相当寂静，只看到内殿灯上发出的红宝石似的

光，圣坛上方挂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雨点敲打着高处的窗子。

我身后传来一阵脚踩石地的嚓嚓声，接着，有人用带着沙哑而又坚定的声音说：“我能为您效劳吗？”

我转过身来，看见一个神父站在圣母堂门口，高而瘦的身材，穿一件法衣，铁灰色的头发修剪得紧贴着脑袋，一双深陷的眼睛给人有病后初愈之感，面颊上紧绷的皮肤更加深了这种印象。这是一张奇特的脸。要说这个人当过兵或做过学者，一点都不会使我感到吃惊，但我记得那块告示板上说他是耶稣会的会员。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这也是一张长期生活在痛苦中的面容。在他往前迈步时，拖着左脚，拄着一根刺李木手杖。

“您是维里克神父吧？”

“是的。”

“刚才，我和在外面干活的那位教堂执事谈了几句话。”

“噢，是嘛！那是拉克·阿姆斯比。”

“如果他叫这个名字，那就是他了。他认为您能帮我点忙。”我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我叫希金斯，杰克·希金斯，是作家。”握手前，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因为他要把手杖从右手换到左手。即便如此，我仍觉得他在态度上显然有所保留。他问：“希金斯先生，我该如何尽力呢？”

“我正在为一家美国杂志写文章，需要历史资料。昨天，我到了克勒的圣玛格丽特教堂。”

“那是座漂亮的教堂，”他坐在就近的一条板凳上，对我说，“请原谅，这些日子我总感到疲劳。”

“那边的教堂墓地里有一块木碑，”我继续往下说，“您或许知道吧？上面写着‘献给詹姆斯·格里夫……’”

他立即打断我的话插嘴说：“‘……一六七六年一月二十四

日，在巴巴里的特里波勒港烧船时，他是克劳德斯里·沙夫尔爵士的助手。”他流露出笑容，又说：“那是这一带的一块名碑。”

“根据我的考查，在格里夫任‘桔树号’船长时，他有一个叫查尔斯·盖斯考涅的伙伴，这个人后来当了海军上尉，一六八三年因旧伤复发而死，好象是格里夫把他的尸体运到克勒的。”

“我明白了。”他很有礼貌地说，但对此并未表示特别的兴趣。可事实上，他的语调已显露不耐烦。

我说：“在克勒的教堂墓地里可一点踪迹也找不到，教区记录中也无案可查。我还到过威夫顿，格兰福和布拉克奈的教堂，也毫无结果。”

“你认为会在这儿找到什么线索吗？”

“我又翻阅了一下笔记，想起他小时候是个天主教徒，我想，由于信仰上的关系，他或许葬在这儿了。我现时住在布拉克奈旅馆，和那里酒吧间的侍者谈话时，他们告诉我，斯塔德利·康斯特堡有一个天主教堂。这个路边的小地方，我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找到。”

“恐怕也无济于事，”他撑起身来说，“我在圣玛丽教堂已经二十八年了，我敢说，我从未发现过有关这个查尔斯·盖斯考涅的蛛丝马迹。”

这是我的考查能否获得成功的最后一个机会了，他的答复使我感到失望和沮丧。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试着又问了一句：“您确实认为毫无办法了吗？那个时期的教区档案呢？里面的注册簿上不是有死者登记吗？”

“我本人也是对当地历史颇感兴趣的一个，”他说这话时似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没有涉及本教堂的有关文件可寻，我自己也还不摸底呢。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是不会在任何地方找到有关查尔斯·盖斯考涅的消息的。现在，如果你不介意，我要去

吃晚饭了。”在他往前移步时，刺李木手杖滑了一下，使他几乎失去摔倒。我赶忙去扶他的手臂，不料踩了他的左脚，他却丝毫也没缩步。

“对不起，我太笨了。”我向他道歉说。

他第二次露出了笑容说：“虽出了事，但没伤着，”他用手杖在脚下使劲敲了敲，“他们说这是个捣乱的讨厌家伙，可我还得靠它活动呢。”这是一句不用加以评论的话，他显然也不想招人非议。我们一起沿过道往前走，由于他的脚不方便，所以走得很慢。我先开口说：“一座多么漂亮的教堂呀！”“是呀，我们为它而自豪。”他随口答了一句。

他替我把门打开，对我说：“很抱歉，不能再帮什么忙了。”我答道：“那不要紧。”随即又说：“趁我还在这儿，我想再到墓地去转一转，您看可以吗？”

“我知道要说服你是不容易的，”他说这话时并无恶意，“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有些很有意思的墓石，我特别提议你到西边的那个地区去看看，那都是十八世纪初叶当地一个石匠的手艺，他在克勒也是干这活儿。”

这次是他先伸出了手。我去握时，他对我说：“你知道，刚一听到你的名字时，我就觉得有些耳熟。你是不是去年写过一本关于爱尔兰东北部问题的书？”

“是的。”我回答说，“事情糟透了。”

“战争就是这样，希金斯先生，”说这话时，他脸上带有一种凄楚的表情，“战时人最残酷！再见吧。”

他把门关上。我走进了门廊。真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相遇。我点上一支烟，走入雨中。此时教堂执事已到前面干活去了，墓地里只有我一个人。当然乌鸦除外，这些来自列宁格勒的乌鸦。我又琢磨了一下这句话，然后就干脆不去想它了，我还有别的事儿

要做哪。并不是因为与维里克神父交谈过后我对寻找查尔斯·盖斯考涅的墓有了多大希望，而只是实在别无他处可觅了。我依次查寻，从西头开始，边走边留意神父刚才提到的那些墓石。它们使人看了觉得好奇，上面雕刻着一根骨棒与头形的粗糙装饰物，旁边还刻着天使。真有趣，不过这一时代与盖斯考涅却毫无关系。我用了一点二十分钟的时间看完了这一部分，最后真是灰心丧气极了。不过，有件事值得一提，与当时的郊外墓地不同的是，这个墓地显然管理得井井有条，地上的草割了，灌木丛修剪了，没有多余的杂枝乱叶。

这么说我是再也找不到查尔斯·盖斯考涅了。我站在一个新挖的墓前，承认自己劳而无功，一无所获。为了挡雨，老执事用一块防水油布盖上了新挖的墓，有一边塌了下去，我蹲下身把它拉好。正当我站起来时，发现了一件怪事。一两码外教堂塔下的墙内靠里的地方，一片绿草丛中有着一块平墓石。那是我刚才提到的十八世纪初叶当地一个石匠的杰作，上面有精彩的骷髅与十字骨交叉的标记，是奉献给一位叫耶莱米亚·福勒的羊毛商人及其妻子与两个孩子的。当时我正蹲着，因而注意到了在它下面还有一块石板。我身上的那种居尔特人的本性很容易地表现出来了，一时激动得几乎失去理智，仿佛意识到有什么非比寻常的奇事就要发现了。我跪到墓石上，试着用手往下面去摸，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就在这时，忽然石板移动了。“出来吧，盖斯考涅，”我轻声细语地说着，“要能找到你有多好啊！”石板往旁边滑去，斜躺在草堆上，这下可一目了然啦。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到惊心动魄的时刻。

那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上有德国十字标记——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那种铁十字，十字下面用德文镌刻着“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战死的库尔特·施泰纳中校和十三名德国伞兵安葬于此。”我的



德文水平一般，主要是因为不常用它，不过看懂这些内容还是绰绰有余。我把它们译成英文，蹲在雨中仔细地校对译文。我的译文是对的，但不能说明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有关这方面题材的文章。据我所知，一九六三年，在斯塔福特郡的坎诺德猎场开辟了个德国军人公墓。在两次大战中死于英国的四千九百二十五名德国官兵，都已迁葬到那儿去了。这块墓碑上刻着是在战斗中死去的。这是不可能的，这太荒唐了。准是什么人故意搞来迷惑人的。

一声出其不意的叫喊打断了我的思路：“你这个人究竟要干什么？”说话的维里克神父打着一把大黑伞，一步一跛地穿过墓石朝我走来。

我兴奋地对他说：“神父，您一定会对我的发现感兴趣的，我在这儿找到了您意想不到的东西。”

在他渐渐向我走近的时候，我感到不对劲儿了，我准是捅了什么漏子，只见他气得脸色发白，浑身颤抖。

“你怎么敢动那块墓石呢？你这是——亵渎神明。”

“要是这样的话，我请求您原谅。不过，请您过来瞧瞧我在这儿发现了什么！”我说。

“我不管你在下面看到了什么，赶快把那石板放好！”神父说。

这话可把我惹急了，直想朝他发火，我对他说：“别装糊涂了，难道您竟会不知道石板上刻着字？如果您不懂德文，我可以效劳。‘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战死的库尔特·施泰纳中校和十三名德国伞兵安葬于此’，现在您还没嗅出其中十足的法西斯血腥味儿吗？”

“我没有这种特殊感觉。”

“您的意思是说，您以前从未看见过上面刻的字吗？”

“没有，当然没有。”

他有些忐忑不安，语调中差不多带有绝望之感，他说：“现在请您把那块墓石放回原来的位置好吗？”

从初次见面，我对这位神父就不信任。我问他：“这个施泰纳是谁？他是干什么的？石板上刻的字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已经对你说了吗，这些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他显出更加心神不定的样子。当时，我记起了一件事，就对他说：“一九四三年您就在这儿了，对不对？那时您刚到教区任职。教堂里的记事板上就是这么写的。”此时，他精神上已完全崩溃了，泄气地说：“我最后再说一遍，请你把那块石板照老样子摆好行吗？”

“不，恐怕我不能照办。”

奇怪的是，此刻他似乎恢复了某种自制力，便安然地说道：“那没关系，我让你马上离开此地总是可以的吧。”

鉴于他当时的心境，我没再争辩，只简单地对他说：“好吧，神父，您要赶我走的话，我只好遵命。”在我踏上小径时，听他喊道：“别想再回来了，要不，我会毫不犹豫地叫地方警察来。”

我走出大门，开车离去。他那威胁的口气并未吓倒我，因为我对自己的意外发现感到太激动，太困惑了。斯塔德利·康斯特堡的一切都是神秘的，就象北诺福克的一个地方，简直不能再象了。犹如你某日偶遇而不复再见的那种小村子，不由得使人怀疑这样一个地方是否真的存在过。

这个地区并不复杂，有教堂，带围墙的花园内是祭司的住宅，还有十五、六间样式相同的小屋；沿小溪散建着一些别种样式的房子，装有大小轮的磨坊；密树绿荫的斯塔德利庄园对面是乡村客栈……

我走上小河边的路，点了一支烟，静静地把这件事的全过程

大略回顾了一遍。维里克神父说了假话，我可以肯定他以前见过那块石板，而且知道其中的奥妙。倘若这样想，可真是讽刺性十足了。我只是为了寻找查尔斯·盖斯考涅的遗骨，才偶然到斯塔德利·康斯特堡来的，结果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一个真正的待解之谜。可是，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就这样了结吗？

看来还得从拉克·阿姆斯比身上找突破口，我的这个想法差不多与执事本人同时出现。只见他从两个小屋间的狭窄过道中往外走，还是浑身溅满泥，肩上背一个旧粮袋。他穿过大路，走进了斯塔德利庄园。接着，我就下了汽车从后面追他。据入口处的挂牌所示，酒店主人名叫乔治·亨利·威尔德。我打开门，走进一个墙上镶着嵌板，地下铺着石头的走廊。左面的一扇门微开着，从里面传出喋喋不休的谈话声和突然爆发出来的一阵哈哈大笑声。里面没有卖酒的柜台，只是一间大而舒适的房子。石砌的炉上生着火，还有几只垫高的长凳和几张木桌子。六七个顾客中没有一个年轻人，我敢说他们的平均年龄足有六十岁——这是现时农村地区常见的一种令人伤脑筋的情况。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村民，有着饱经风霜的面孔，戴着苏格兰式呢帽，穿着不透水的胶鞋。三个人在玩多米诺骨牌，两个人在旁观看。靠火炉坐着一个老头儿，在轻声慢气地吹着口琴。我进屋时，他们都抬起头，用一种熟人打量一个陌生人的样子，仔细观察我。“中午好。”我说。两三个人笑着对我点了点头。一个长着一脸黑中夹灰胡子、膀大腰圆的人，显得不甚友好。拉克·阿姆斯比正独自坐在一张桌前，卖力地用手指卷着烟丝，面前摆着一杯淡啤酒。他把卷烟放到嘴上，我凑过去给他点了火，说：“呶，这儿。”他没有表情地看了一眼，随后显出很坦然的样子。

“噢，又是你。找到维里克神父了吗？”他问。

我点点头，对他说：“还想再来一杯吗？”“怎么会不想呢？”他

几大口就把杯中的酒饮尽。随口说：“一品脱黑啤酒下肚真痛快呀。乔治！”我转过身去，看到一个带着套袖的粗壮汉子站在我面前。可能他就是店主家乔治·威尔德吧。瞧上去他与周围人们的年纪相仿，显得颇有理智，只有一点与众不同：他一生的某个时候曾被人在很近的距离往脸上打过一枪。我见过的枪伤很多，所以能很有把握地判断出来，子弹无疑是他的左颊擦过去的，还碰着了骨头。他能大难不死是很幸运的。

执事开心地笑了笑说：“您不喝点什么吗？先生。”我告诉他说，我想来一大杯伏特加和补药。这下可把在座的农民们逗乐了，或许他们有别的想法，不过这并未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因为这是我在高兴时喝的唯一掺酒精的饮料。拉克·阿姆斯比的卷烟不一会就抽完了。我递给他一支自己的烟，他也立刻接了过去。酒送来了，我把他那一份推到他的面前，问道：“你说过你在圣玛丽教堂干了多久来着？”“四十一年。”他开怀畅饮起来。我又说：“来，再干一杯，给我讲讲关于施泰纳的情况。”

突然间，口琴停吹，谈话中断，老拉克·阿姆斯比的目光向我扫来，又露出了先前那种狡黠的表情，他对我说：“你问的是施泰纳？怎么啦，施泰纳是……”乔治·威尔德一下插到我们中间，伸手来取空杯子，又在桌上铺了一块布。对我说：“先生，到点了。”我看表，两点半钟。我对他说：“你弄错了，离关门时间还差半小时哪。”他拿起我那杯伏特加，把它递给我，说：“先生，这是间不正规的酒店，象我们这种平静的小村子，营业时间由我们随意而定，没人干涉得着。如果说两点半关门，那就是两点半。”他友好地笑了笑，又说：“假如我是你，我就会把这杯酒喝下去了。”

屋里的气氛很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他们全都坐着盯住我，面容严厉而呆板，眼光冷酷又坚定。那位黑胡子“大块头”走

到桌子对面，靠着它，目不转睛地瞧着我。他以低声且带威胁的口吻对我说：“你听说施泰纳的事了。现在你要象个好孩子一样把酒喝下去，然后就走吧，往回家的路上走。”这时，气氛显得更紧张了，已不容我再开口。我用相当时间慢条斯理地喝了那杯伏特加补药，也说不上这一举动是冲着他们还是为了我自己，随即就离开了。

奇怪的是我竟然一点也不感到饿，此时我已完全陷入到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中，想脱身也不可能了。一定得想法搞到点线索。顿时，一个简而易行的办法涌到我的脑海。

我登上小汽车，驶过桥，出了村，经过教堂和祭司住宅，开上了去布拉克奈的路。车驶过教堂几百码后，我把它停在了走马车的道上，从汽车的手套箱里取出一个小型照相机带在身边，又往回返。

我一点也不感到害怕。记得曾经有过那么一次，我被几个口袋里带着枪的人，从伯尔福斯的欧罗巴旅馆伴送到机场。他们说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建议我乘下一班飞机离开，不要再来了。然而，我还是回去了，而且还不止一次，甚至从那儿拿出来过一本书。

当我重新返回教堂墓地的时候，发现那块为施泰纳和他的士兵而立的墓石与我方才离开时摆的一模一样。我又对了一遍碑文，以免弄错了出丑，并从不同角度拍了几个镜头，随后就匆忙地从教堂旁走了进去。塔的下方横着一块布帘，我是从那后面过去的。唱诗班男孩子们的猩红罩衣和白法衣，整齐地挂在一个横木条上。里面有一只包着铁皮的箱子，上面还往下吊着几根打钟用的绳子。墙上的一块木板把下列情况公诸于众：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教堂的钟为小罗伯特鸣了五千零五十八下。我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拉克·阿姆斯比也作为六个打钟人之一而名列于